

##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I

# 毛泽东亲历记

宋健魁 编著

- △长征途中即考虑抗日问题
- △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烛光下与斯诺彻夜长谈
- △坚持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
- △抗战时刻中国大思路的总设计师
- △研究制定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
- △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 △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 △提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 △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 △领导延安整风
- △确立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 △发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有一位国外的军事家曾说过：“战争指挥是一门特殊的精雕细琢的艺术”，而军事统帅的胆识、谋略和智慧对于赢得战争的胜利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虽然没有到前线去放一枪一炮，也没有直接指挥一次战斗。然而，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那炉火纯青的战争指挥艺术却让人叹为观止，让人感慨万千，而让敌人心惊胆战。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八年抗战，即使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也决不妥协，决不退步。他以他那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领袖的感召力，形成了使抗战走向光明的统一战线；他以献身的精神唤醒了全民族的危亡感；他以伟大的凝聚力，他利用各种机会向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国内外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决心，唤起了全民族拯救危亡的勇气和信心。在抗战最艰难的相持时期，他认识到并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开展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在抗战的后期，他号召一切人民的军队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实施了成功的战略大反攻。

博览中外名书，熟读中国屈辱的近代历史，使毛泽东早就萌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在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井冈山领导红军进行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一起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对国民党军阀的不抵抗主义和他们“既不为国，也不为民”的反动本质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他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共同抗日，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唤醒毛泽东民族反抗的情绪的话，那么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如何抗日的问题了。1935

年 6 月召开的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作了关于日军向北平开炮情况的汇报，会议发表宣言，并决定在红军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加紧开展白区的统战工作。1935 年 7、8 月期间，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川北达雄镇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企图分裂中央，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红军北上，北上的目的除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争取与苏联从地理上靠近，以取得进一步物资上的帮助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考虑就是向北发展可以去抗日，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同年 10 月中旬，毛泽东领导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时，他就让红军在镇子的墙壁上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陕北红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同一时期，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回国传达精神。张浩于 11 月初才辗转来到瓦窑堡，而此时毛泽东正在组织指挥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在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时，指出：这次胜利表明，我们不准许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与全国，不准许国民党卖国到底。毛泽东从直罗镇战场返回到瓦窑堡，征尘未洗，就立即投入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工作中去了。1935 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应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总任务，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因此，他主张主力红军向东发展，打通东进抗日的道路。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将陕北主力红军 1.3 万人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毛泽东亲自担任总政委，与彭德怀一起率领这支部队开始东征山西，开辟了吕梁山根据地。1937 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居住在瓦窑堡，他在这里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导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剧。

1935年12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华北主权进一步沦丧，由此引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12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赞扬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这一战略方针为后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作了奠基礼。接着毛泽东在27日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个有400多人参加的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以他那独有的精辟分析能力，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具有抗日的一面，必须将他们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会上毛泽东还论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所做的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突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制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

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毛泽东以他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巨大的感染力，给国民党元老、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首领写信，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的中心放在了陕甘根据地，以尽快争取实现西北大联合。他首先将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决心以“西北大联合”促进全国大联合。这期间，毛泽东身在山西石楼前线，他与20余名红军将领联名给东北军全体将士写信，打开了同东北军谈判的大门。他亲自面见了被红军俘虏的原张学良的警卫队营长高福源，后来又派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在听了李克农汇报后，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学良进行

有成效的谈判。

1936年3月下旬，在山西前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将国民党分为改良派和民族革命派，而且两者都有左右派之分。他主张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月份，毛泽东移住陕北保安，一面部署红军西征，一面继续开展统战工作。6月24日发出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军争取东北军，是为了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7月27日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称周恩来领导开展的对东北军的工作是“很好的模范”，并指出党的工作部署应将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

对杨虎城 17 路军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早在 1935 年底就亲自点名曾长期负责 17 路军中共地下组织工作的汪锋，带上毛泽东给杨虎城、邓宝珊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同杨虎城商谈抗日合作事宜，打通了与杨虎城的联络。为了推进西北联合战线的建立，毛泽东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写信给东北军和 17 路军将领 阐述中共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先后给东北军第 67 军军长王以哲、17 路军总参议杜斌丞、杨虎城将军等人写信，加速推动他们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这一时期，西线出现了“无战事”的太平局面。但是从长远看，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全国的大联合才是实现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于是他十分清醒地将统一战线的视野扩大到全国。红军东征之时，毛泽东就曾给阎锡山写信，开展对晋军的统战工作。来到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先后又给邵力子、宋庆龄、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界爱国人士写信，力陈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于促成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爱国人士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为毛泽东的爱国热情所打动，纷纷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

1936年6月，由于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旗号，发动两广事变，蒋介石对西北采取了缓和政策，通过秘密渠道开始与中共谈判。毛泽东根据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于8月间正式放弃“抗日反蒋”，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新方针。但是10月份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又企图以武力解决西北问题，两党的和谈直到西安事变前未取得任何进展。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表现出极为娴熟的斗争艺术，一方面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斗争的灵活性，把斗争的对象变为可争取的同盟者。10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张学良，宣布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红军将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12月1日，再次写信给蒋介石，要蒋“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但蒋介石仍然执迷不悟，并于12月4日再度飞抵西安，胁迫张、杨加紧“剿共”，这样终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高级将领，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毛泽东电悉后，于当天深夜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在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并鲜明地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应该坚决拥护。在听取其他同志的发言后，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中间立场”，不应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应高举抗日援绥的旗帜。14日毛泽东等人联名致电张、杨，表示“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15日毛泽东等致电南京，指出西安事变“实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之结果”，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在19日召开的第二次西安事变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

泽东分析了当前严重的内战危机和走向抗日的前途，突出地谈了战与和的问题。他说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抗日，而不是蒋个人的问题，并主张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他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倡议在南京举行和平会议，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方针。周恩来赴西安后，毛泽东于 21 日对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局势、我党的策略、谈判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等作了进一步详细的指示。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为我党或他个人的私仇所扰，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于放走蒋介石，党内很多高级干部想不通。毛泽东亲自到红军大学作报告，他讲到，如果杀了蒋介石，正中敌人的下怀，国民党亲日派会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帜，进逼西安，全国的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我们则是不记前仇，以德报怨，迫蒋共同抗日“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

此后，毛泽东一直密切注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1937 年 5 月底，毛泽东亲自布置迎接国民政府中央考察团。在欢迎晚会上，毛泽东指出民族危机严重，国共两党团结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群众大会上指出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他极富感染力的讲话，对于使考察团合作促进国民党政府对日抗战的实现起了重大作用。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延安举行的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上说，为巩固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任务就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他指出：在统

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总结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日本后退是暂时的假象，是为了破坏我们刚刚形成的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正确性。

1936年7月，蒋介石着力平息两广事变之时，西北出现了局部相对稳定的态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门，第一次向一个外国记者敞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迎来了第一位“外宾”。在这里，红色根据地的领袖毛泽东会见了美国的记者斯诺，开始将苏区的情况向外界作公开报道，斯诺本人也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而长久的友谊。毛泽东与斯诺的漫长谈话都是在烛光下的夜间进行的，持续时间将近4个月。斯诺住在保安的这段时间几乎天天到毛泽东的窑洞，每次谈话一般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毛泽东非常重视这项看似普通的工作，因为这时国统区一切进步书籍都被列为禁书，共产党人的言论不可能得以公开发表，而斯诺则不受种种限制。与斯诺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毛泽东重点就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阐述。

虽然壁居延安的窑洞，但此时的毛泽东深察国际风云变幻，他科学地预测了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并提出了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必需条件。尽管这时离全面抗战爆发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毛泽东就看到了日本侵略的严重性，看到了日本的大陆与海洋政策已包含我全部大陆领土和东南亚诸国。毛泽东以极富洞察力的远见论述了抗日战争正确的战略方针，即用红军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逐渐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牵制敌人的战略进攻和展开，同时还要组织广大的游击队进行敌后袭扰。战争后期由于缴获日军的装备和争取外国的援助，战斗力得到加强的中国军队可以从事阵地战。毛泽东十分坚定地指出了中国人民肯定将日本侵略军驱逐出

中国。

总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毛泽东就以他极其惊人的洞察力，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一般形势、发展规律，预见了在战争前期、中期和后期不同的战略战术以及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和最后结局。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进一步充分论述了他的上述观点，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为毛泽东预见的准确性与深刻性所折服，命令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研究这一战略思想，并破例允许在一向禁止出版共产党人著作的国统区出版阐述这些思想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形势的基本特点，阐述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为什么一定要捐弃前嫌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合作，阐述了抗日战争与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指出现阶段应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以及毛泽东这些极富胆识的远见，都通过斯诺之笔得以在外国公开发表，然后又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各地刊出，这就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在非常和谐而亲切的谈话中，斯诺发现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世界历史是异常惊人的熟悉，他问及英国工党目前的政策使斯诺无言以对；毛泽东也谈到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看法，使斯诺很感兴趣。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当面向一个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说，今天苏维埃的对外政策首先要受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制约，各友好的国家可以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凡是参加这个联盟的国家，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欢迎。当时毛泽东还主张，中国同友好国家应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毛泽东还谈到了未来外国在中国投资的问题，谈到了是否承认中国的外债问题。他说，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都是合法的。毛泽东还应斯诺的要求，谈了

如何对待外国教士问题和中美、中英关系问题，并且第一次正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指出共产国际曾为中国作过重要贡献，但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在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毛泽东居住保安的这段日子，生活上是相当艰苦的，但外界一般不十分清楚。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以后，人们才知道毛泽东住的四壁简陋的窑洞和不能再差的伙食。这次采访给斯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个在哲学和历史方面极有造就的学者，是一个颇有天才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家，是中国当时最有才干的战略家。斯诺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以至于多次恳请毛泽东谈个人生平，而后来从自传式的谈话中，斯诺又深深感受到，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金钥匙。在长达近百天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概况；第一次对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第一次分开他个人的生平历史；第一次公开中国共产党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预见等等。贯穿这些谈话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这些谈话表现了伟人毛泽东卓越过人的智慧、非凡的思辩能力、对事物发展的惊人的洞察力和成熟的政策水平，表现出了毛泽东坚定的抗战决心和必胜的勇气。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延安交给了红军。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毛泽东随部队一到延安，就喜欢上了这座陕北的“大城市”，他像一位博学的历史家和考古家，以极为深沉的眼光审视着延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审

视着延安的一切。此后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住又是十年时间。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陈设极其简单，仅有一张南方式的四腿床，一张没有油漆的三屉桌和两个白铁皮箱子。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使毛泽东患了严重的疾病，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但他仍然坚持与大家同甘共苦。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干部身上，毛泽东仍然决心把在江西创建的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并且自己兼任了红军大学的政委，每当开展重大活动时，毛泽东都去亲自作报告或进行讲课指导。他在红军大学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将学员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理论天地。他科学地规定了战争的概念，提出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并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红军的作战原则。1937年初，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又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使抗大培养了大批抗日军政干部。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在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由于党的许多干部还缺乏思想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为了正确把握斗争的方向，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并最后给张国焘在实际工作中改造错误的机会。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呼吁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自己也发愤读书。这时期他批阅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学者的哲学著作。并且初步尝试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两个版本上写下的近 1.3 万字的批注，后来就形成了著名的《实践论》。在掌握了理论武器之后，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头脑，然后开始对中国革命进行哲学思考。他辩证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十几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高度科学的概括。他为抗大学员作关于哲学基础讲演而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运动在

理论上升华。他提出了认识的规律和矛盾的规律，为在思想路线上清除“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铺平了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提供了哲学依据。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对抗大抱有很高的期望。为了把大批的学员培养成为具有良好军政素质的干部，使其成为执行全面抗战路线、英勇抗击日军的骨干，毛泽东特别严格地要求抗大学员，并在时间、精力上花费了极大心血。每期学员开学，他都要亲自接见，并给大家讲抗大的历史和未来，做深入实际的动员工作。他为抗大的黄克功事件彻夜不眠，思虑再三。最后，还是忍痛割爱，同意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以便对其他的党员干部引为前车之鉴。他甚至为抗大的爬山训练都亲自做学员的工作，使他们从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毛泽东以极大的心血精心培育着抗大这朵抗日花园中的奇瑰。他亲笔题词，规定了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还亲自题写了抗大的校风，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同时，毛泽东对另一所延安的抗日干部学校——陕北公学也极为关心，每逢重大活动都亲临指导。他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青年学习“鲁迅精神”，他称赞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缩影，并多次对学员讲解抗日游击战争和《论持久战》等军事理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公然制造事端，炮轰卢沟桥，发动事变。宋哲元率领国民党第二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全面抗战由此爆发。第二天，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体红军将士，要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9月下旬，蒋介石开始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

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是在如何抗战问题上，蒋介石认为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而毛泽东则坚持把发动人民群众作为抗战最首要最基本的条件。在 1937 年 8 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日军用兵的战略方向，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提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两党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历史教训。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顺利通过，同时，他本人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正式制定了我党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

8 月 25 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抗大学员充实到各部队，以加强领导和指挥力量。他认真研究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区域，并征得国民党有关方面的配合。同期毛泽东还指导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在 1937 年 9 月 28 日国民党当局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同意。因为当时叶挺已长期寓居海外，中央对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并不了解，所以我党希望叶挺能到延安面谈一次。11 月 3 日，叶挺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亲自迎接，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亲自陪同叶挺到抗大和中央党校参观。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起义中的历史功绩，与叶挺就统一战线、合作抗日等问题取得了充分的谅解和信任。然后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正是在毛泽东的信任和关怀下，叶挺上

任后为新四军的筹备和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为实现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必须从军事和政治上创造条件。我党一方面精心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线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工作都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毛泽东还针对新的形势，提出如何巩固统一战线的问题，防止合作后可能出现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右倾投降情绪。针对国民党的“溶共”政策，毛泽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抵制。

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正面战场很快溃退，而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则狠狠打击了日军，于是延安成为抗战胜利的希望，也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人们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的主张，动员各界人士为抗战效力。有一次接待一位著名教授时，毛泽东曾将当时仅有的一支香烟掰开共同享用，使对方激动不已。毛泽东先后接待了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文学青年萧军、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等社会名流，毛泽东的真诚接待更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1938年4月17日，毛泽东接见了卫立煌率领的第二战区前方总部人员，向他们谈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谈了投降主义的问题，而且谈了山西的抗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防止日军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卫立煌等人深为折服，他们回到西安后，即发来了100万发步枪子弹、25万枚手榴弹和180箱牛肉罐头。

在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指挥军事作战、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之余，认真研读了大量哲学和中外军事著作，写了很多的注释，并且成就了他一生最富辉煌的军事理论著作，有代表性的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这些著作构筑了中国

的大思路，而毛泽东为之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几乎是没日没夜地思考、写作，累时就在简陋的布躺椅上靠一会，或用湿毛布擦擦脸，继续坐到办公桌前写作，经常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这些典型的军事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科学体系已经形成并走向成熟。这些军事理论著作影响和指导了抗战和中国革命逐步走向胜利。这些军事理论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预测了战争的发展走向和必然结局。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一系列预测是惊人地准确，毛泽东规定的战略方针和抗日策略是异常正确，极富科学性。

在进行军事研究的同时，毛泽东对中国抗战胜利后将向何处发展的也进行了认真的构思，断然指出中国的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他首先设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满足于理论上的论证，同时把他的大思路放到抗日根据地里去验证，将陕甘宁边区办成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办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英明领袖，早在抗战时期，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发展大思路的总体设计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全国全面抗战的形成和最终取得胜利所做的贡献是极为突出而不可磨灭的。他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解放战争，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发动人民群众。他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正是因为毛泽东在抗战前后致力于发动民众的工作，才造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特别是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形势，才陷敌于人民战争的火阵之中。毛泽东在形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唤起全民抗战的过程中，他极为娴熟的斗争艺术得到完美的体现；他矢志不移地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善于把涓涓细流汇集成波澜壮阔的大海，把一盘散沙拧成一股强

有力的投石；他利用自己人格的力量，在全国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动员起了全国的民众，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的抗日积极性，形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钢铁长城。

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等红军将领于 7 月 14 日即表示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客观地分析了红军的特长和不足，提出了适合红军的军事战略原则。8 月 1 日晨给红军前线指挥部周恩来、博古等人的一封电报中，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红军抗战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三日后，毛泽东又电告参加南京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人提出了四条补充，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8 月 7 日，毛泽东命令统一改编后的红军各部准备开动。

在 8 月 22 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由于时间较短，全党对战略方针问题没有很好地进行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更多地强调分兵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致电彭德怀、朱德对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进一步进行解释。他亲自指挥了八路军三个整编师在山西展开部署。9 月 21 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正确分析了阎锡山的战略意图，并对华北地区的战局进行了展望，同时详述了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看法。在电文中，毛泽东表示，八路军相机集中给敌人以打击是可以的，但“仍以适时把中心工作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在后来给朱、彭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华北我